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裴传永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邓小平理论 与中国传统文化

主 编 裴传永

副主编 王 敏 杨明清

张艳君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主编裴传永.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35-2840-0

I. 邓… II. 裴… III. 邓小平理论—关系—传统文化—中国—研究 IV. 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0419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北京奥达福利装订厂装订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34 千字 印数: 1—3500 册

定价: 21.00 元

绪论 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这一论断表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天然自在、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是摄取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有益营养而结出的一个理论硕果。邓小平同志的人生经历也充分证明，学习研究古代典籍不仅伴随了他的大半生，而且古代典籍中所反映出来的优秀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邓小平于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由于生不逢时，他受到的正规教育并不多，充其量只有旅法勤工俭学前的十来年的中小学教育以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年左右的高等教育，难怪他经常对子女们说，他只有中学文化水平^①。然而，邓小平的知识却是非常渊博的，他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而且精通中国历史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和中国文化；不仅懂得政治、外交和军事，而且懂得经济、科技和教育，正因如此，他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立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的渊博的学识不是凭空得来的，这来自于他的勤奋学习。邓小平酷爱读书。诚如其女邓榕所说：“父亲爱学习，终生爱学习。他从书本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从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学习，更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① 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典籍是邓小平读得较多的书类之一。读古代典籍，是邓小平终生不渝的爱好。他这个爱好的形成，与两个人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刘伯承。毛泽东的文章和演讲经常运用古代典故，使人听起来生动亲切、妙趣横生；刘伯承也称得上是“书痴”，虽戎马倥偬仍手不释卷。常言道：近朱者赤。一遍遍地阅读广征博引古代典籍的毛泽东的文章，长时期地与“书痴”并肩战斗，邓小平即使想不形成爱读古代典籍的习惯也难。邓小平很善于见缝插针地读古书，据有的同志回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会见外宾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还捧起一本古代文学作品看上一会。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发表于1998年2月18日《北京日报》上的《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在回忆邓小平晚年的生活时写道：“爸爸特别爱看书。……出差时有时候也带一二本《聊斋》、诗词一类的书，抽空就翻翻。”饭桌前往往也是邓小平与子女们探讨文学和历史的场所。邓林具体描述道：“讲文学，爸爸主张背。我们在饭桌上背《岳阳楼记》，背《木兰辞》，背昆明大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2页。

观楼的长联，……大家抢着背，看谁背得多，大人、孩子一起争，你说这句，我说那句，气氛非常感染人。讲历史，孩子们就讨论孔明如何，曹操如何。……文化的题目、历史的人物、事件，对现实生活各种事物的分析，或褒或贬，纷纷嚷嚷……这一切，成为我们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可见，抓紧点滴时间读书，是邓小平终其一生的习惯和爱好。

邓小平读过的古代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经类主要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孝经》等；史类主要是“二十四史”特别是其中的《史记》，以及《资治通鉴》等；子类主要是《孙子兵法》等；集类主要是《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的代表作，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可以说，古代哲学、历史、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邓小平都下功夫研读过。

邓小平比较系统地研读古代典籍，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童年和少年时期，一个是谪居江西时期。这里先说前一个时期。邓小平原名邓先圣，5岁就进了私塾接受童蒙教育。私塾的老师感觉邓先圣这个名字不好，听起来似乎对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有所不敬，就为他改名邓希贤。邓希贤这个名字他一直用了20年。无论是“先圣”还是“希贤”，个中都鲜明地体现着传统儒家的道德追求，因为自孔子以降，从战国时期的孟轲、荀况到西汉的董仲舒，再到南宋的朱熹直至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历代大儒都把成贤成圣作为理想人格来推重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邓小平在他的童稚之年即被父母和老师以成贤成圣相期许，这似乎预示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在其人生历程中产生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邓小平在私塾接受的童蒙教育，主要内容便是浓缩了传统文

化思想精华的《三字经》以及《千字文》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百家姓》是过去曾被广泛使用的童蒙读物。毛泽东初入私塾，跟从塾师邹春培学习，是从《三字经》学起，邓小平亦然，但凡是解放前出生的人，识文断字莫不是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开始。可以说，童蒙教育已经引导着邓小平迈入了传统文化思想宝库的大门。

在接受了一年的童蒙教育之后，邓小平于6岁时进入协兴乡的北山初级小学读书。初小的课程，主要就是学习、背诵“四书五经”的节文，“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的合称。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老师作了讲解、领读之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背诵课文内容，并且对于老师的提问，他往往回答得头头是道，因此颇得老师的喜爱，同学们尽管不少人比他年龄要大几岁，但在学习上莫不对他心悦诚服。在北山初小的四载寒暑中，邓小平除了一次因为患病只考了个第二名之外，其余各次考试他都是名列榜首。

1915年，11岁的邓小平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广安高等小学堂是当时广安县惟一的一所高级小学，而且每年只招收一两个班三四十名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是绝对考不进来的。邓小平能进这所学校读书，本身就说明他是一名优等生。广安高小的课程，仍然是以学习、背诵“四书五经”为主，除此之外，还教授一些古代文学名家的名篇力作，比如唐宋八大家的代表性作品。三年的高小学习，使邓小平的传统文化素养较之以前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

1918年，邓小平高小毕业，升入广安县中学堂。然而入学不久，社会上便形成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邓小平怀着一

腔报国热情，也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传统文化典籍的系统学习只好暂时告一段落。

再说后一个时期。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遭受迫害、失去人身自由的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劳动改造”。临行前，邓小平把家中几乎所有的藏书，统统装进木板箱，打算带到江西，在劳动之余，系统地加以研习，但是由于飞机超重，只好改由火车托运。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几箱子书还没有托运到。这时，酷爱读书的邓小平坐不住了，他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在简略地讲述了来到江西一个多月的劳动、生活情况之后，特别写道：来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原说由火车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在当时那样一种情况下，邓小平仍念念不忘读书，实在令人钦佩。

邓小平谪居江西的三年时间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是早晨6点半起床，7点半从居住地出发前往工厂，8点开始劳动，11点半返回居住地，吃完午饭后休息一会，然后读书看报，再干点农活，晚上听听广播，再接着看书。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①邓小平谪居江西期间读过的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现当代中外文学名家的代表作等应有尽有，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也在其中占有极大的比重。邓榕回忆说：“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事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统统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②除了“二十四史”、《资治

① 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通鉴》之外，《诗经》、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也是邓小平非常喜欢阅读的书籍。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邓小平对古典文学名著的喜爱。据说1970年的一天，报纸上发表了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邓小平看到这条消息后，非常兴奋，很快就找到当时在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担任秘书的赵子昌同志，请他代为购买这批书。赵子昌跑了很多地方，终于将这套书一本不少地买回来，并送到邓小平的居住地。邓小平抚摸着这些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古典名著，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日复一日的刻苦攻读和认真思索，使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糟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得失，形成了非常系统和深刻的认识，这就为他后来领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节 邓小平思想行为的传统文化烙印

邓小平在童稚之年曾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谪居江西期间又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古代文史名著，此外，领兵打仗的间隙和工作之余，他也始终注意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学习，因而在他身上洋溢着一种睿智儒雅的风采，放射着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我们回顾一下邓小平的人生历程，分析一下他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不能不承认，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积淀形成的那些优秀思想和崇高精神，在邓小平身上有着非常清晰而集中的反映和体现。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展开论述，只能择其要者略加阐释。

一、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传统渊源

所谓忧患意识，就是指对现实状况不盲目乐观，能够正视存在着各种问题，敏锐地察觉潜伏着的各种危机，积极寻求对策加以克服这样一种思想态度。对于忧患意识，用古代成语来表示就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邓小平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1975年初，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受命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将近9年，全国的形势非常复杂而严峻，而“四人帮”却不顾客观存在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事实，还在起劲地鼓吹什么“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邓小平出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冒着巨大的风险，雷厉风行地主持进行了对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全面整顿。1975年3月5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上客观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指出：“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哪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①这番话虽然不是什么长篇大论，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溢着对国家经济状况的深切担忧，是一种忧患意识的真实流露。然而非常可惜，全面整顿刚刚见到一点成效，邓小平却又一次被打倒。

时隔两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当时，“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口号叫得很响，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他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旗帜鲜明地指出：“‘两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

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① 为了成功地实现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对理论界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明确给予支持，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道：“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 邓小平从事关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看待思想路线问题，把亡党亡国与“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直接联系起来，这毫无疑问是忧患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先后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忧患意识色彩的论断，比如“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生死存亡”、“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落后就要挨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发展是硬道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教育不抓要误大事”，等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在许多次讲话和谈话中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可以说，忧患意识深深地植根于邓小平的头脑中，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正是因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有这样一种可贵意识，20世纪的后20多年里，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才可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发展自己，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20世纪的后20多年必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而载入史册。

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前已述及，邓小平读过许多古代典籍，而古代典籍中的忧患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周易·否卦》九五爻辞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意谓君子（“大人”）即使处于有利的形势下，也应保持一种戒惧之心。《周易·系辞上》写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显然是古代居安思危思想的最初阐发。与《周易》这种戒惧危亡的忧患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诗经·小雅·小旻》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战战兢兢”形容极度戒惧小心的样子，而“临深渊”、“履薄冰”的险象描写更有助于人们体味、感知为什么和如何戒惧小心。《尚书》是夏、商、周三代重要历史文献汇编，其中的许多篇文献特别是周初周公所作的几篇诰辞，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开明统治者对政权兴亡原因的深刻认识，表露了深重

的忧患意识。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当纲纪顿失、天下无道的春秋后期，他忧道不忧贫，为了建立有道之世而周游列国奔走呼号，逮至晚年，当意识到自己不能有为于当世之后，他把全部精力用到删订《诗》、《书》、写作《春秋》的事业当中，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赞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战国中期的孟轲是孔子学说的重要传人，有“亚圣”之誉。孟子同样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一词也首见于他的著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便是从他口中说出的一句名言，至今仍为人们经常引用。他看到群雄逐鹿、生灵涂炭的严酷现实，忧心如焚，四处游走，广为宣扬孔子的学说，极力劝说各国统治者舍弃暴政，施行仁政。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

秦汉之后的漫长封建社会里，从陆贾到魏征，从范仲淹到顾炎武，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到康有为、梁启超直到孙中山，历代志士仁人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强化和发展不断作出贡献。陆贾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警示汉初统治者牢记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把得民作为保其位、王天下的首要前提；魏征在李世民坐定天下后，奏上一本《谏太宗十思疏》，其中“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不念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以伐根以求木茂，塞源以求流长者也”、“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

^① 《孟子·梁惠王上》。

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谄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等等数语，真可谓是忧患意识的集中流露；范仲淹仕途坎坷，然而却“进亦忧，退亦忧”，始终以天下为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出自其人之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今天仍然是广为人们传诵的名言佳句；顾炎武生当清兵入关、故土沦丧的民族危亡关头，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振聋发聩的呐喊；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处于西方殖民者仰仗“坚船利炮”大肆进犯、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生存危机的严峻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上下求索，勇敢地喊出了“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康有为、梁启超围绕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方之所以先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的落后、西方的先进，表现在器物的层面上，而根源却在于制度的层面，进行制度的改良是他们提出的救亡图存的基本主张；孙中山在康、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倡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成功地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运动。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内涵日益丰富。虽然不同的思想家，由于时代条件不同，其忧患意识的具体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关注国计民生、追求民族富强是古往今来忧患意识的共同特点，这是贯穿于从孔子到邓小平的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根红线，从中也可窥见邓小平忧患意识源于传统忧患意识并与之一脉相承的鲜明特点。

二、邓小平爱国情怀的传统熏染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

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1984年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文字中情感色彩最浓的一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邓小平对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无比自豪，感受到他内心里激荡着的炽烈的爱国情怀。1990年，在会见泰国客人的时候，邓小平又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①这番话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对于祖国历史的熟稔，而且也反映了他维护祖国独立和尊严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同样充溢着浓重的爱国情怀。

爱国的一个具体而重要的表现就是具有民族自尊心，讲究民族气节，用邓小平常用的一个概念表述就是维护国格。邓小平说过：“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②他还说：“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③讲究民族气节、维护国格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做出了极好的表率。他在一系列外事活动中，在会见英国、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3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

国等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维护中国的主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如 20 世纪 80 年代，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位“铁娘子”主张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在 1997 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对这个蛮横无理的主张，邓小平斩钉截铁、针锋相对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①再如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美国就是要把台湾当作其在亚洲和太平洋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②。中美建交后，美国一些人仍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1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6 页。

然在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美国的态度再强硬些，中国也无可奈何，一定会把台湾问题像一只苍蝇一样吞下去。对此，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指出，不会吞下去，不会的！如果真的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决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维护祖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邓小平如此炽烈的爱国情怀，显然与传统爱国主义思想的熏染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孔子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积极倡导者。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为了抗击齐国的侵略，鲁国的一位名叫汪錡的男童勇敢地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最前线，不幸战死。按照惯例，未成年男子死亡应视为夭折草草掩埋即可，但是听说了汪錡的故事后，孔子深为感动，说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意思就是对于因为拿起武器保卫祖国而牺牲的未成年人，可以不作为夭折而予以隆重安葬。孔子周游列国期间，齐国又兴兵伐鲁。孔子闻讯，即刻把众弟子召到跟前，说道：“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①在孔子督促下，弟子子贡奔走往来于齐、吴、越、晋、鲁诸国，充分施展其外交才能，纵横捭阖，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鲁国转危为安。孔子游历各国，总是说走就走，毫不迟疑，但是每次离开鲁国，都是慢慢腾腾，欲行又止，弟子怪之，孔子说：“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②可见孔子不仅以爱国教育弟子，他自己在行动上也做出了表率。

战国时期的屈原也是一位可钦可敬的爱国主义者。屈原生当

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② 《孟子·万章下》。